

12.05



銅陵文史資料選編

第四輯



一叶轻舟日边来（铜陵西江）



金 榴 紫 藤



春风又绿江南岸（老洲牧场）

目 录

皖南事变前后铜陵敌后的敌伪工作	(1)
罗卜冲战争的回忆	(23)
龙口岭战斗	(29)
新桥头激战	(32)
难忘的战斗集体	
——记铜陵县第一个妇女支部诞生经过	(34)
魏涌烈士传略	(44)
人民不会忘记他的	
——忆铜陵敌后英勇抗日战士叶为枯	(46)
爱国人士陈春圃赞	(52)
铜陵学生抗日救国行动事略	(55)
<u>铜陵民众总动员会始末</u>	(57)
血溅庵门	(62)
日军侵占索山始末	(65)
巧改碑文唾日寇	(70)
抗日战争时期铜陵日伪政权组织	(72)
助纣为虐的铜陵保安大队	(76)
铜陵区域与人口演变简述	(80)

顺安“三月三”庙会	(84)
笠帽山史话	(88)
铜陵生姜简史	(92)
狮子山上的皖南联中	(95)
明伦小学“先声球队”	(98)
铜陵临时中学与王培棠先生	(101)
历史上的铜陵“灯会”	(103)
谈富览亭中的楹联	(106)
漫话博戏	(109)
顺安镇回民简史	(113)
旧时顺安当铺	(116)
顺安会馆简况	(118)
顺安新街考略	(120)
历代名家作品中的师承与渊源	(123)
试论人民政协文史资料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126)
编后	(134)

皖南事变前后铜陵敌后的敌伪工作

朱 农

铜陵，位于长江南岸，背负皖南腹地，历来为军事上的防范要塞。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铜陵敌后既是打击敌人，保家卫国的战场，又是保证我新四军游击队辗转大江南北的一条重要水上交通线。“皖南事变”以后，这条“通道”的重要性，显的愈加突出。

正因如此，铜陵敌后在整个八年抗战中，一直成为敌、伪、我剧烈争夺的焦点，长期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的斗争局面。为保卫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保障我军的南北畅通，面对敌、伪相勾结的进攻与蚕食，铜陵敌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给入侵的日寇以严重的打击。同时，还运用一系列的特殊方式从敌人内部开展敌、伪军工作。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曾经对此指出：“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政策。对其动摇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论政策》）遵照毛泽东同志这一重要指示，铜陵敌后在抗战时期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做好敌伪军的争取分化瓦解工作，成为当时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有效的斗争方式之一。现就我个人的回忆和所了解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 铜陵沦陷与敌后形势

一九三八年春季，日军飞机首先轰炸了铜陵县的江岸重镇大通和悦洲，但没有立即占领。待至同年阳历十一月才从水陆两路齐头并进铜陵。水路由芜湖至铜陵、大通登陆，随之进入董家店、新建一带。陆路由芜湖经繁昌、黄浒直入钟鸣、顺安、张家冲等地。日军所到之处，均事先用飞机狂轰滥炸。记得当时已临初冬，日机在我的家乡朱家嘴也丢了两颗炸弹，正在户外的老百姓有三人被炸死。国民党军队不加抵抗，日军一踏上铜陵和大通的江岸，切断水上交通线之后，国民党部便仓皇出逃，后又由董家店迁到三条冲。县政府也迁至谢家墓附近的费村，接着又迁至三条冲。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很快便占领了顺安、新庙、张家冲、铜陵县城等地。不到一年时间，铜陵敌后主要城镇大多数被日军占领。日军所到之处，建立据点，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惨绝人寰。铜陵人民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铜陵敌后也从此揭开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的战斗序幕。

一九三年下半年，已入皖南的新四军三支队神速进入铜陵。党派张伟烈、曾如清、张世杰、方休、谢节之等同志来到铜陵敌后，组织领导铜陵地区的抗日斗争。首先恢复建立了党的组织。在成立中共铜陵县委后，张伟烈、张世杰、张东同志先后任县委书记。

铜陵县委辖一个中心区委、三个区委。三九年八月，我接任了中共铜陵敌后中心区委书记。十月，任县委委员兼敌后中心区委书记。十二月以后，任县委宣传部长，仍兼任敌后中心区委书记。当时，铜陵敌后中心区委辖民和、翠桥、栖凤、忠信、汀洲、安平、流潭、大通、羊山、柴塘、润北冲等乡（大

通、羊山、柴塘三地，四一年十一月间划归敌前县委领导），以及铜陵县城、老洲和当时属无为的胥坝，属繁昌县的永丰圩、紫沙等地。亦即后来的铜陵敌后县委的管辖范围。到四〇年六月前，敌后中心区委下面先后建立了十一个乡级党支部。年底，敌后党员数发展到一千一百余人。

各级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大力组织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军登陆后，章啸衡同志立即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文沙洲组织沙洲抗日游击队，并被委任为大队长。章啸衡同志是当地颇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此人地主家庭出身，但仗义疏财，性情豪爽，为抗日救国广交朋友，曾经参加共产党。抗战以后，恢复了党籍。

张伟烈、曾如清、方休等同志不仅帮助指导沙洲游击队的建立，又在朱村郎坑帮助刘功臣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以后，敌后游击队也相继成立，叶维枯同志任游击队队长。一九四〇年九月，我们又成立了敌后抗敌自卫委员会，和各乡抗敌自卫委员会，代替了国民党的敌后政权。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如“农抗会”、“妇抗会”，农村进步哨等早已到处成立。大力宣传抗日政策，除死心塌地的汉奸之外，只要愿意抗日的（包括地主和士绅），都可以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来。铜陵敌后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地，越烧越旺。

面对着汹涌而起的抗日浪潮，日寇企图用武力征服中国的梦想破灭了，便采用“以华治华”的政策，建立他们的伪政权——维持会。他们把地痞、流氓、鸦片鬼子搜罗起来，为其利用。但这些社会渣滓，声名太臭，无法能支持起维持会的门面。他们便捉来地方士绅，出任维持会长。试图利用这帮汉奸搜集我方情报，对付我抗日游击队。利用他们配合日寇清乡，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因而这个时期，

铜陵敌后的敌、伪工作，中心围绕不让建立维持会而展开激烈的斗争。

（二）围绕建立维持会的斗争

从一九三八年底，日军占领铜陵，到四〇年的六月，这一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三种不同的斗争方式，但目的都是一个，牢牢掌握抗日斗争的主动权，粉碎敌人“以华治华”的罪恶阴谋。

第一阶段——反对建立维持会：

日军侵占铜陵不久，首先在县城建立了第一个县维持会。城关的小学教员、地方士绅王庭基最先投靠日军，出任县维持会会长。名为维持会，实则只能管辖城里而已，王庭基从来不敢出城活动。但日军的计划是以此为起点，逐步把他的伪政权向敌后四乡的据点里延伸。这阶段，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建立维持会。严惩敢于站出来替日军组织维持会的汉奸头面人物，便也叫嚷要在汀洲乡建立维持会。章嘴衡得悉后，立即派游击队把他处决了。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向人民群众，也向地方士绅进行宣传：中国人不能当汉奸，不能替日本侵略军服务，不能出卖中国人。谁当汉奸就坚决镇压谁。

这样一来，更多的群众觉悟了，少数想当维持会长的人，也吓得缩了回去。阻止了日军整个侵略计划的推行。

第二阶段——拖延时间建立维持会。

到了一九四〇年六月间，日军在铜陵敌后各乡，基本上都建立了据点。据回忆日军先后在铜陵所建据点有铜陵县城、大通、顺安、董店、柴塘、张家冲、长龙山、鲢鱼山、索山、孤城圩陶、犁桥、坝埂头、沿船沟、姚家套、胥坝、汀洲、新

庙、老洲、铜官山、扫把沟等二十余处。以后文沙、老观嘴、山东圩姚村、齐潭孙村也建立了日军据点。形成五里一堡、十里或十五里一据点的局面。敌人不仅在这些据点里凭借刺刀的威吓，推出一些汉奸建立维持会，还在据点周围的一部分村庄里，开始着手建立伪保、甲组织。针对这一变化了的形势，我们就动员各方人士，拖延建立维持会的时间，来和敌人周旋。敌人来了，要他们逃跑躲避，不让给“捉”去当会长。同时采用“钻肚皮”的战术，开始将我方人员逐步打入伪政权去，播上火种。如后来打入日军报到班充任“密探”的共产党员马玉拣，最初便是受命在县城外五里亭村担任伪保长。

由于我们的拖延政策，使日军在侵占铜陵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只能在一些大据点里建立维持会，始终很难向我敌后纵深地区发展。从而使我们赢得了时间，集蓄了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许多维持会在第三阶段的斗争中，才能乖乖地听从我们的安排。

第三阶段——同意建立维持会：

鉴于铜陵敌后广大农村，已为日军全部占领。大大小小的敌据点里，炮楼林立，铁丝网遍布，许多汉奸人物躲在敌据点里先后当上了维持会长。这时，建立乡维持会和伪保甲组织已势在必行，反也反不了，倒不如因势利导，变敌伪政权为两面派政权，为我掌握，为我利用。因而我们同意建立维持会和保甲组织，但前提必须接受以下条件：一、乡维持会长和保长人选要经过我们同意；二、把日伪的活动情况及时向我们汇报；三、不准破坏抗日组织，不准抓抗日人员和群众；四、对被日军抓去的抗日人员和群众，要设法保释。同时警告他们：不接受以上四条担任伪职的，一律以汉奸论处，格杀勿论。

维持会长多数答应条件，才敢上任。这是因为他们看到，我敌后党的组织逐渐扩大，有部队，有农抗会、妇抗会等许多种抗日群众组织，他们害怕掉脑袋。

对于已建立起来的维持会，则采用打击顽固的，争取中间的，来分化瓦解敌人。坝埂头维持会会长鲁复初，人称小鲁，获港人。此人是个鸦片鬼子，表面上对我方阳奉阴违，实则暗地里竭力为日军效劳。我们果断地干掉了他。这一行动，对其他地方的维持会长很大震动。使他们相信，新四军说话是算数的。因而多数维持会竭力保持中间状态，有的还主动和我们拉关系。如张家冲维持会长邵先贵便是一例。此人小枫树附近人，小知识分子，开酒坊出身。他看到当时形势，便通过伪保长姚成玉（共产党员）跟我们联系，表示愿意效劳。后来也有实际行动：一次，日军在城半圩扫荡，一位女干部不幸被张家冲的鬼子捉去。县委立即指令邵先贵设法保释；邵即在日军面前把她保释了。查××在皖南事变突围中，途经张家冲，被日军捉住。也是由邵先贵给保释的。为了不暴露身份，查在维持会里当一般伙计，然后回部队。还有民运工作队队员华名楷，也是经邵先贵保释后，再按我方意见，给留在张家冲维持会工作的。不仅如此，邵先贵每月还给我们送情报，送来一部分食盐。直到皖南事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邵先贵一直表现很好。还有不少维持会在发放“良民证”时，主动把盖好了军印鉴的空白良民证送给我们，由我们发放给地方工作需要的同志，以作掩护。

以上围绕建立维持会斗争的三个阶段，只是斗争方式上的划分，不是时间上的截然分开。其工作往往是交叉进行的。如在“反对”阶段，便开始选派人员准备，如反对不了，即开始选派人员准备打入伪政权内部。又如“拖延”阶段，如发现有

我们合适人选的地方，我们也因势利导同意建立。并非一概而论，目的是拖延时间，要把敌伪政权转化为两面政权，控制在我们手里。

这个时期铜陵敌后的敌伪工作，和其它各项抗日工作一样，是先后在铜繁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新四军三队的帮助指导下积极开展的。这段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对于皖南事变后铜陵敌后敌伪工作的深入一步开展，对于我们后来在困难条件下能够胜利坚持，和巩固发展铜陵敌后抗日根据地，都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皖南事变后的敌、伪工作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东南局根据党中央指示，为团结抗日，命令皖南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北移。同时指示在敌占区的铜陵敌后县委不北移，继续领导敌后军民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把铜陵建成抗日游击根据地。铜陵敌后县委也就是这年六月间撤销敌后中心区委以后成立的。县委书记张伟烈、付书记朱农、组织部长张秀芝、宣传部长陈尚和、军事部长叶为枯等。同年十二月，上级党委为了在新四军撤出皖南后，加强对铜繁芜地区的集中统一领导，成立铜繁芜中心县委，由张伟烈任书记，直接领导铜、繁两个敌后县委。将铜陵县委改为铜陵敌前工委，归铜陵敌后县委领导。我任铜陵敌后县委书记。组织部长鲁生，宣传部长陈尚和，军事部叶为枯等。这时，已是皖南事变前夕，政治上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们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任重道远。但我们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因我敌后已不是两年前的局面：群众普遍发动起来了，不仅有游击队，有各种群众抗日组织，还有一支一百八十多人的游击队、青年营和自卫队，一部分敌伪组织（维持会、伪保甲、伪

警察)已为我们所控制。更重要的有铜繁党中心县委和皖南特委的领导，敌前党委和部队的大力支持，我们完全有能力坚持下来。我们决心不辜负党的信任和委托，团结敌后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斗争，夺取胜利。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重庆政府背信弃义，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新四军军部及所部九千余人在遵命北移抗日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七万人的突然袭击，除二千多人浴血突破重围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顿时，整个皖南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的彻底暴露，铜陵的敌后形势逆转：日军大肆宣传，“皖南新四军已经消灭。”

“铜陵敌后游击队一个月以内就要消灭。”国民党更是亡我之心不死，他们的军队无法进入铜陵敌后，就派遣一些特务、流氓和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投靠日寇，企图借用敌军之手来消灭我敌后根据地，他们掌握伪政权，组织伪自卫队、突击队、警察、扩大新亚队做爪牙，配合日军进行扫荡。敌伪沆瀣一气，企图强迫抗日人员自首，破坏抗日组织；大肆捕捉抗日人员和群众。与此同时，维持会的情况也开始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死心踏地追随日寇，坚持与我为敌。如一惯反对我们的县城维持会和流潭乡维持会。位于新庙据点里的楼凤乡维持会，早先还能支持我们，这时风云突变，变为最反动的敌伪组织；二是两面动荡，观望等待，维持中间状态。如胥坝、汀洲、安平等地的维持会；三是原来不反对我们的，在形势恶化的困难时期，仍照过去一样帮助我们开展抗日活动。如孤城圩、坝埂头、张家冲等地的维持会，在这些地区，我地方工作干部的活动，一般只要带上良民证，不带枪，都能通行，不出问题。

在这急剧变化了的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如何扭转不利局

面，坚持敌后斗争？县委召开了会议，认真分析研究形势，商讨新的斗争策略，不久，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李步新同志（负伤）和杨明、马惠芳等同志来到铜陵敌后。步新同志同意我们所分析的形势和斗争部署，并同时指出：在这革命处于暂时低潮，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更需要依靠和组织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要分化瓦解敌伪组织，打击最顽固的汉奸、卖国贼，争取中间状态的伪政权，迅速扭转局面。步新同志的指示，坚定了我们的斗争信心，更使我们认清了做好分化瓦解敌伪军工作的重要意义。铜陵敌后县委很快就作了布置，在继续积极扩大武装、抓住一切时机打击敌人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敌伪工作。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① 杀一儆百。

如前所述，皖南事变以后，日寇嚣张，汉奸特务猖獗，隐藏在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地痞、流氓，公开暴露，反对抗日，有的地方干部叛变投敌。在各种敌对势力中，对我威胁最大的，是一些顽固的汉奸分子。他们中有的人是叛徒，有的是恶棍、地头蛇、反动仕绅。他们共同点是任敌作父，横行乡里，残害军民。同时熟悉地形，熟悉地方情况，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不杀掉这些汉奸罪魁祸首，非但不能争取敌伪人员里的中间分子，处于革命低潮时期，群众也难以发动起来。因此敌后县委决定从“锄奸”入手，擒贼先擒王，杀一儆百。

拿谁来开第一刀？选择的结果是大汉奸查啸泉。

查啸泉系城郊忠信乡人，家住城子圩塘村。是个地方恶棍。出于阶级本性，他和最反动的新庙据点里的汉奸王其干、崔光斗、叛徒张贤狗等人一惯来往密切。此刻更是狼狈为奸地勾结一起，投降日寇，为虎作伥。这家伙高高的个头，常穿一件木

本缎长袍，架着一付墨镜，手持文明棍，看上去很有派头，实则阴险毒辣。他虽未担任伪职，但他是日军一条重要的鹰犬。经常出入于城里维持会，沿栖凤、忠信、犁桥等县城外围一带活动。他先指使栖凤乡王其干等搞自首活动，在那里别说抗日人员难以存身，连农村递步哨也要抓去自首。接着他又计划朝忠信、犁桥等乡推行自首活动。在查啸泉密谋驱使下，许多维持会也正准备效法他开始搞自首。铲除这条走狗，斩断他的魔爪已属刻不容缓。于是县委指示游击队干掉他，并暴尸桥头，张贴他的罪状。罪状是以“新四军七师长江锄奸团”的名义公布的。旨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敌后军民斗争。这一革命行动，立即震动了整个铜陵敌后，使群众知道，也使一切敌伪军知道，新四军是打不垮，杀不尽的！

接着，我们又在敌人猖獗的犁桥据点里，里应外合，处决了罪大恶极的维持会长、姓邵的鸦片鬼子，以后继续处决了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汉奸叶茂华，以及汉奸大小二胡太珍等。处决这批汉奸以后，我们通过地下工作者将标语、传单带进据点里，四处张贴，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人民欢欣鼓舞，敌人胆战心寒。敌后的险恶局面，很快得到控制和扭转。伪政权中除去一部分坚持反动立场外，多数摇摆不定的“观望派”，象胥坝、汀洲等乡的维持会则表示愿意继续支持我们。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又开始活动了起来。

② 打中有拉。

还有一些汉奸，罪恶深重，理应受诛，但由于他们深藏在日军的卵翼之下，很难下手。对这种人我们便采用打拉结合的办法来控制住他们。栖凤乡新庙据点里的王其干、张贤驹、崔光争等就属于这些人。这伙人既反动，又狡猾，他们把家属都

搬进了日军的据点附近的王村，终日凭借着日军刺刀的庇护，干着罪恶的汉奸勾当：破坏农抗会、递步哨，用各种方式胁迫我乡、保和抗日组织人员登记自首，捕捉我方人员和革命家属。那年，我父亲就是由这伙人带日军给抓进了新庙王村维持会。也曾一度把我递步哨变为他们所用。查啸泉被处决后，王其干在新庙叫嚷：要替查啸泉报仇、要活捉朱农。这伙坏蛋龟缩在日军据点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竟公然宣称他们所居的新庙王村是“租界”，是“保险公司”。那时栖凤乡确是被这帮家伙把持的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只要我们一去人，就很快知道，以致我们不能在这个乡进行活动。鉴于此时当地的特定情形，对这班死心塌地的汉奸，只有用“打”才能达到“拉”的目的。于是县委决定：打新庙“租界”，触动“保险公司”，重金悬赏，处决汉奸王其干、张贤驹。非以此不能控制栖凤乡。

有一天，王学来到了敌后，我笑着问他：“王学，你不敢到新庙去打王其干？如果你能干掉王其干，我要重赏你。”其实我心里清楚，王学是新庙王村人，对那里的地形熟悉，且机智勇敢，精明能干，派他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王学一听去打王其干，激动得一跳起来：“请朱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我深知，王学同志绝非是为賞金而深入虎穴的。他是怀着一腔民族义愤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才向党组织接受任务的。可当时新庙据点附近王村，确实是个龙潭虎穴呵！于是我们一起认真研究了这次行动方案。我给了他一支驳壳枪，并派孙林同志上犁桥街买了两斤酥糖，给他路上食用。

陆路上有敌人递步哨，我们使用船从东芫里将王学悄悄送至王村山嘴入了境。当晚王学摸进王村，找到了村党支部书记